

Stat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Order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

——国际政治变迁的研究——

俞沂暄 著

现代国际政治始于西欧，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主导了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的衰落，国际政治的重心渐渐跃出了欧洲的范围，在地理上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

世界秩序这些变化的源头要到主要国家自身的传统、变迁中寻找，而不能仅用力量变化的逻辑来解释。

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国际政治，需要深入研究欧洲国家近三百年的发展。

要理解20世纪的世界政治，则需要探究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特征。

时事出版社

Stat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Order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

— 国际政治变迁的研究 —

俞沂暄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对国际政治变迁的研究/俞沂喧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232-264-6

I. 国… II. 俞…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015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 字数：25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资助基金资助

目 录

导言 回归传统：国家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	(1)
---------------------------	-----

第一部分 欧洲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危机

第一章 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间秩序	(30)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的涵义	(31)
第二节 同质之列国秩序	(40)
第三节 主权国家与均势秩序	(44)
第二章 国家内部的发展及其国际后果	(71)
第一节 绝对主义国家与战争	(71)
第二节 战争与国家权力的集中	(77)
第三节 国家特性与战争面貌	(85)
第四节 自由主义国家及其国际秩序	(94)
第五节 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	(109)

第二部分 美国与世界秩序

第三章 美国：新国家与新外交	(132)
第一节 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源：立国经验	(133)
第二节 “进步的”帝国主义	(149)
第三节 “新自由的”对外政策	(162)
第四章 美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	(174)
第一节 中立政策的内涵	(176)
第二节 实施中立的矛盾	(185)
第三节 “民主”抗衡“专制”的战争	(197)
第四节 无法实现的“没有胜利者之和平”	(202)
第五章 美国一战后的新秩序构想	(211)
第一节 新秩序构想的形成	(212)
第二节 新秩序的本质特征	(226)
第三节 新秩序的内在矛盾	(234)
第四节 手段背离目的	(252)
第六章 美国特性与 20 世纪的世界政治	(264)
第一节 改变现状的舆论要求	(265)
第二节 革命后的苏俄与美国的反应	(275)
第三节 国际制度的美国政治基础	(293)
第四节 非西方的反抗与美国的对策	(305)

结语 同质抑或多样化的世界?	(318)
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43)

导 言

回归传统：国家理论与 国际政治研究

本书试图研究现代国际政治的变迁。

现状与变迁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对于国际政治研究来说也概莫能外。通常情况，国际政治研究用体系转换来描述和解释国家间关系态势的变迁，如从多级体系到两级体系，或者到霸权体系等。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则会使用一些具有历史内涵的概念来描述体系的转换，诸如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等。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对国际政治的变迁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他认为，国际政治的变革（change）存在不同等级，按照从最根本的变革到最常见的变革等级，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为体系的变革，这是最根本的一种变革，指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者或者不同实体性质的变化，如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体系；第二类是系统性变革，指国际体系的控制或统治形式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权力分配的变化，因此，系统性变革主要关注在国际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兴衰；第三类为互动的变化，指运转中的国际体系的实体之间以有规律的进程或互动形式发生的变化，它不会改变体系或

系统层次的现状，仅仅涉及具体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最常见。除了按照变迁的层次进行划分以外，吉尔平还根据变革的强度区分了渐进性变革和革命性变革。^①虽然做了这样的区分，但是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体系变革与互动的变化，而是着重描述和解释了系统性的变革。他认为系统变革的本质涉及到“正在兴起的居支配地位的大国取代正在衰落的原来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变革”，^②并采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方法解释这类变革，即通过对变革与维持现状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国际政治变迁的可能性和路径。

吉尔平的分析中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当许多人以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社会的出现作为民族国家体系气数将尽的理由时，只需提出改变民族国家体系成本巨大一个理由，便已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吉尔平的弱点也在于此：在一种对世界政治变迁的解释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经济学的理由。仅凭这一点，便不足以让笃信政治与经济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心服。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批评鼓吹相互依赖论的新自由主义者时说过一句话，他们想把“政治从国际政治中剔除出去”。^③此话至少表明，政治领域的某些问题难以还原或化约为某种成本—收益核算的经济理性。

吉尔平的分析路径停留在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之中，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0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49页。

③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而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思路。考克斯要解释的是社会力量，或者说社会力量中最基本的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世界秩序转换之中的作用。考克斯试图把世界秩序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生产活动与世界秩序之间联系的中介就是国家，而国家的性质由阶级结构决定，阶级结构又和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考克斯对世界秩序转换的研究不是从权力分配以及集中体现权力的大国兴衰出发，而是从生产关系入手。^① 这样的研究路径使考克斯得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并且与吉尔平的看法相对立。当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千年以来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② 时，考克斯却说：“现代史上历次世界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质的不同和结构上的分别。若是认为由于所有的国家间制度都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级权威，因而它们实质上就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会造成理解上的缺失。世界秩序间的质的区别影响到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率、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前一个世界秩序与后一个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而世界秩序一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③

显然，吉尔平和考克斯代表了两种研究国际政治变迁、乃

① [加拿大]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214页。

③ [加拿大]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主题”，第12页。

至整体国际关系的思路。吉尔平可以称作主流的现实主义者，把国际政治看作权力的对比和分配，看作国家战略和策略的较量，而决定国家战略和策略的则是对决策后果的成本—收益计算。考克斯在方法论上带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注的不是最高层次的力量、策略博弈，而是社会结构对力量、策略的制约。按照吉尔平的逻辑，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变革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的体系特征，即没有共同权威的独立政治体之间的关系。只要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角，那么我们只需要去考察各个主角之间的力量关系，而无需关注体系特征。尽管我们确实可以把国际关系史解读为几个大国纵横捭阖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一百年前的国际关系与今天的国际关系之间的巨大差异：一百年前，主导世界的是欧洲或者与欧洲血肉相连的国家，一百年后，欧洲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洲而已，亚洲以及原先由欧洲统治的地区在法律上取得了与欧洲同等的地位；一百年前，政治家们不会为了某种传染病的跨国传播而坐在一起开会，尽管那时像西班牙流感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夺去的生命甚至多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但政治家们的头脑里装的仍然是裁军之类的“军国大事”；一百年前，攻击最强大国家的敌人只可能是与之匹敌的大国，一百年后，最强大的国家却在“基地”组织这样的敌人面前显示了脆弱的一面……要解释这些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变迁至关重要的差异，吉尔平的方法似乎于事无补。

对此，考克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回答，至少指出了一个人可以做出回答的方向。这一方向就是在国际关系与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可以通过社会生活的结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迁，同时还可以从国际关系变迁的角度对

社会生活进行解释。但是考克斯的方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当他把生产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力量解释世界秩序时，他站立的位置似乎是社会学，而不是政治学。换言之，当我们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使用“世界秩序”这一概念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基本政治态势的变迁。

本书的研究路径从基本的方面而言，与考克斯的关系更为密切，即本书也试图把国际政治的变迁与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变化联系起来。毕竟，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早就讽刺过所谓的“现实主义”学派，他说：“此学派喜欢设计种种国家及这些因素的所谓国家利益，并给这些利益涂上不言而喻和从不变化的色彩，还认为各种事态只是计算实力，力求平衡从而妥协的结果。”^① 自然，国际政治中的各种事态并不只是实力计算的结果，实力计算可以改变最表层的态势，但是却逃不脱深层结构的制约。但是，与考克斯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是，本书把基本政治单位的变化，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窥视国际关系变迁的出发点。

本书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关系，国际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基本面貌应该由各个时代互动的政治单位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构建；人类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即经济结构、暴力/军事组织方式、观念与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基本政治建构，但是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基本政治单位的性质及它们之间达成的态势，对于国际关系变迁的作用依赖于对基本政治单位的影响。换言之，经济、军事、观念等因素既受制于政治因素，又不断影响着政治因素，

^① 转引自〔美〕斯坦利·霍夫曼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促使政治因素不断地对在这些领域中相对独立产生的变化做出反应，从而使自身得以调整，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变迁。总而言之，基本政治单位的变化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在现代世界，“基本政治单位”就是主权国家。同为主权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与传统，将意味着不同的国际政治秩序。

为了把上述思路表达得更加清晰，下面将分节论述：首先，第一节和第二节指明了对该思路启发颇深的两种观点，并比较本书与它们的异同；第三节和第四节将着重论述这一思路的方法论基础，并对以政治因素统驭其他因素是否合理进行解释；最后一节将阐述具体的研究框架。

一、现实主义

关注基本政治单位的研究取向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现实主义。对于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基本政治单位”无疑为主权国家。现实主义正是把国家视作国际关系中的唯一主角，把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交往、争夺，或许还有合作看作国际关系现状与演变的主要内容。至于国家的变化决定国际关系的变迁，似乎也是现实主义的老生常谈，比如，大国的兴衰就引起了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变化，从“英国治下的和平”到美苏两极，再到今天有人所说的“美国独霸”。

无论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还是关注体系对国家制约的新现实主义者，都认为是国家，而不是非国家的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首要地位。对国家这种作用的坚守是现实主义最值得人们重视的一点，也是现实主义在当今世界仍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与现实主义者的

立场一致。

但是，现实主义者在把国家认定为国际关系的首要行为体后，就把国家自身的问题放到一边了。他们关注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活动及其后果，而国家在此期间被视为一个整体，并被赋予了如同个人般的理性。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把权力看作国家追求的利益，因此他说：“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夺权力的斗争。”^① 沃尔兹用安全代替权力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并且批评传统现实主义者考察国际政治没有“从它们处境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不去考虑更高一级的结构组合可能有自身值得研究的特性”。^② 根据这一思路，沃尔兹转而去关注国际体系对国家的压力。由此可见，国家只不过是以后来的理论展开而设定的前提条件，现实主义者关心的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国家本身的构成、受到的影响以及发生的变化。或许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这可以放在国内政治领域中去解决。

现实主义者的这种倾向近年来受到了一些批评。被认为是建构主义者的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就说，国家的结构一直在不断演化。自从500年前国家在欧洲确立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担负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至少也是很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单元，但国际关系理论却很少涉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册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②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及国家变化的过程。^① 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状况，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眼里无疑成了这个学科的缺陷。一位社会学家曾批评说，所有国际关系学者常犯的错误，就是“轻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强调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②

国际关系理论到底该不该讨论国家的变化问题，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问题。诚如费丽莫所言，近 500 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变化对国际关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大概不会有人相信。确实，最宏观的叙述可以用“无政府状态”来概括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国际关系，但是“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只有在与现实具体情况相符合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也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周遭的世界。韦伯（Max Webb）说过，在人类文化科学中，概念的构造依赖于问题的提出，而后者是会随文化自身的内容而变化的。概念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服务于认识那些因个别观点而有意义的联系的目的。正是因为历史概念的内容必然是可以变化的，所以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予以精确的表述。^③ 据此，“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等概念作为认识的手段，的确需要随着实际事态的变化而不断作出修正。

要精确表达国际政治中的概念，首先需要重新审视被现实主义者当作前提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本书区别于现实主义，而与历史社会学发生了联系。

① [美] 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3 页。

②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191 页。

③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5 页。

二、历史社会学

本书采纳最基本的国家概念，即国家代表了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在对国家进行研究时，不是只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而是试图展现政治因素与经济、军事、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关系，从而把国际关系的变迁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样的思路无疑受到了历史社会学的启发。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研究了军事力量在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中的作用，并把控制暴力工具与资本主义、阶级冲突的研究结合起来，勾勒了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出现及其扩展。^①

在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中，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强制因素和以资本为代表的经济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在强制、资本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建立了相互作用的关系图示。蒂利的核心观点是，在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压力下，欧洲统治者需要从社会榨取资源满足进行战争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强制与资本集中的不同模式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道路和不同类型：在强制密集的模式下，统治者依靠榨取机构从统治的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勃兰登堡和沙皇俄国即是此种类型；在资本密集的模式下，统治者依靠和资本家的契约来租借或购买军事力量，如荷兰；在资本化强制模式中，统治者采取相对中间道路的策略，但是却能够把资本家和资本来源吞并到国家机构中去，英国和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该书观点的概述参见第1—7页“导论”。

法国就走了这条路。^①

麦克·曼（Michael Mann）从文明起源写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皇皇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对于本书的影响尤其重要。曼认为，人们由于要追求各种目标，因而建立了许多相互作用的网络，其中最大的四个网络构成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②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种社会权力对社会的存在与演变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如意识形态权力在 18、19 世纪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8 世纪，经济和军事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但是到了 19 世纪，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不断增强，军事力量逐渐被吸纳进国家体制，又由于两次工业革命的作用，所以政治和经济力量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导。^③ 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相互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部分地交错在一起，它们形成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决定了社会生活的“混杂”特征。由于曼不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是看作各种网络混杂而成的，因此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可能完全制度化，在网络的各种间隙慢慢形成的变化，会逐渐汇聚成影响社会变迁的新因素。为此，曼为解释社会变迁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间隙出现”（interstitial emergence），并承认这是受了马克思的启发。马克思曾认为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社

① [美]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4—35 页。

② [英] 麦克·曼：《社会权力的来源——自起源到西元 1760 年的权力史》，李少军等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版，第 30—39 页。

③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7 页。